



后人类主义视野下的竞技、身体与科技

李传奇

摘要: 探讨后人类主义的思想内涵,认为:后人类主义主张应用科技手段克服身体的有限性,强化并完善人类身体的整体功能;通过对身体观的考察,思考不同身体观对待科技改造身体的态度。由于竞技体育追求卓越、追求极限的特征,后人类主义所倡导的科技观在竞技体育领域有所实践,并使得竞技体育领域出现科技崇拜的现象。通过对竞技观的深入思考,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为消解技术理性的霸权,保持竞技体育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底蕴,应加强“自律”,加强“自觉”,增强“反思”能力,确定并设置严格的技术界限。

关键词: 后人类主义;竞技体育;身体;科技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9)03-0076-04
DOI:10.12064/ssr.20190311

Body,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Li Chuanqi

(Department of sport,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 of post-humanism. Post-humanism advo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reak through the soma limi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human bod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views of soma, the attitude of different soma views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body by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Due to the nature of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ultimate achievements in sports, the id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posed by post-humanism has been practiced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has even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worshi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is field. Through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views of competi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should take initiative, strengthen self-discipline, have more reflection, and set strict technical boundaries so as to resolve the hegemony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maintain the cultural feature and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post-humanism; competitive sports; so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当今世界,科技、知识、智能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衍生出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体育学术研究一方面要对传统体育人文精神进行诠释和总结,另一方面也要对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的体育人文现象、体育人文思潮作出迅速、理性的反应和科学的应答。伴随科技、知识、智能的飞速发展,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被激发。后人类主义主张人类应当借助科技、知识、智能的力量使人类进化方式由自然进化转变为自主进化。竞技体育作为展现人类体能极限的舞台,日益受到后人类主义者的关注。后人类主义者认为依靠科技提升身体竞技能力,是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导向的竞技体育的必然发展方向。然而,科技主导下的竞技

体育表现出诸多“反传统”的形象。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当代竞技体育呈现出崇拜科技、依赖科技的后人类主义特征。本文即是对当前科技发展引发的后人类主义思潮,以及现代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科技崇拜与依赖现象作出的审视与反思。

1 后人类主义——科技进步引发的未来人类之思

人既拥有一个作为客体的身体,又有身体性的存在,作为在世存在的身体是教育、文化、科技等力量直接作用的载体。现代社会,身体日益成为各种思想交锋的策源地,各种或保守或激进的思想在身体领域展开争夺与论战。人类对进步、幸福、快乐等美

收稿日期:2018-12-13

基金项目:南京工程学院校级青年基金项目(qkja201605)。

作者简介:李传奇,男,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E-mail:lchqi2006@126.com。

作者单位:南京工程学院 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1167。



好事物有着永恒的追求,然而人类因为身体的自然性却又是有限的存在,所以对自然性身体的强化和改造就成了人类对科技的期待。伴随神经科学、神经药理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太空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人及人的身体的认识不断深化,伴随这种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后人类主义应运而生。后人类主义是指“随着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赛博时空等极富想象力的高科技手段出现,彰显出‘人类身体’日益技术化发展趋势,身体由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本体’转变为具有灵活多变性的生物-技术存在”^[1]。后人类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斯·莫尔、库尔兹韦尔、凯利、斯诺德蒂克以及皮尔森等,后人类主义主张“人类只是进化过程中的暂时阶段,是为‘后人类在作积极的准备’,未来是‘属于后人类’的”^[2]。

从进化论的角度,后人类主义者提倡运用现代科技,使自然的进化让位于对遗传物质改造的人为的自主的进化。从现实生存的角度,后人类主义者提倡人的“赛博”化,所谓“赛博”,哈拉维在《赛博宣言》中的定义是“赛博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机体的杂合,一种社会建构和一种幻想相结合之物”^[3],也就是说通过技术手段塑造更有效率的机体,以符合现实的需要。“后人类主义者注重自我在体力、智力、心理和道德上永恒的进步,重视对知识和理解力的永恒追求,不断消除对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政治、文化、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限制。”^[2]显然,后人类主义对利用科技和理性表现出很强的激进性,对于依靠科技和理性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与发展表现出很强的乐观性,然而对于科技可能带来社会、政治、文化、伦理、健康等方面的风险,他们常不太关注。

2 身体观——科技改造身体的价值向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里,身体逐渐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和主题。诚如布莱恩·特纳所言,“在这个肉体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都是以人类身体为渠道表现出来的”^[4],因此“在一个技术迅速扩展的社会中,人的身体体现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的这些宏观变化产生的后果是,人类身体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席林更直接谈到,“如果说过去的时代中是男性与女性、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令人担忧,现在则是任何机器之间的边界在支配着当代的想象力。”^[5]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的身体活动,身体观对其具有导向和决定

作用。因此通过身体观的研究,可以确立人类的科技行为与身体改造之间的内在向度和尺度,进一步了解竞技体育领域中的科技改造和强化身体的问题。

身体观,即人们对身体的认识和态度,有怎样的身体观,就有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向度。总体来说,身体观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神性主义,一种是物质主义。神性主义认为身体是人的根本,即身体规定了人的本质,身体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身体承载着“天命”,因此身体不容“外物”侵越,任何对身体的侵越,都是对人性乃至整个人类的侵越。这种神圣性,使得身体和技术、机器等存在明显的边界。身体的内在价值应该得到肯定,这种身体观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而物质主义信奉身心二元论,进行主客二分,认为人的本质并非源于身体,而是见证着人的“主体性”的精神,即“我思故我在”。身体仅仅是物质性的客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同外在技术系统进行耦合。在对待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神性主义坚持“无论科学技术对人体的改造和‘完善’有着怎样的‘理想’追求,都不能忘记,人的自然体是几十亿年来大自然演化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弄清大自然的深层智慧和奥妙之前,最好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奥妙之物保持敬畏。而对病残之肌体的医治,也只能着眼于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恢复和完善”^[6]。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绝对地反对科学技术对人的身体的改善,而是反对科学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所虚构出来的各种理想的、标准的人体形态和功能来改造和完善人类的身体。神性主义尊重身体的自然属性,并将此视为人神圣尊严的一部分,认为技术理性的霸权式发展是威胁身体尊严和价值的重要力量。

物质主义在处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时,则主张身体的技术化、机器化,“即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主体所表现出的渴望将机器的智能/功能移植到主体自身之中的强烈意向和朝此方向的实践”^[7]。物质主义者认为“作为对人的自然躯体‘缺陷’的补充,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人的自然躯体的外化……这表明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定势,即它一定是在对自然界物质与能量的转换中,将人的有机躯体一部分无机化,使人最终超越自然生命局限的过程”^[8]。显然,物质主义的身体观认为身体并不分享人的本质,也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身体只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载体,对身体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对人性以及人的本质构成威胁。后人类主义者对待身体的态度则属于物质主义的,表现在竞技领域上,他们认为竞技体育是人以自身为客体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活动方式,不断超越、创造纪录乃是运动人的使命和根本



目的。因此他们主张突破当前科技伦理所倡导的“人应该被修复而不应该被增强”这一原则,认为竞技体育中以自然躯体、自然力作为标准是对主体的一种限制,通过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电子技术以及各种生化或物理的技术方式提升身体力量是应当的,而且是正当的。然而,我们不能沉醉在纯粹科学以及技术理性的世界,我们始终应该认识到我们赖以存在的身体是社会中的身体,是伦理中的身体,是文化中的身体,这就决定了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所秉承的只能是一种偏向神性主义的身体观念。当然,即便是神性主义的身体观念也绝非一味排斥科技,而是在坚持人道、伦理的准则下对科技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3 竞技观——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竞技观是人们对竞技活动的根本认识,是人为何要竞技,以及竞技给社会与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的思考。概括来讲,竞技观反映了体育竞技的目的和意义、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体育竞技不仅是展现人类体能极限的舞台,同时还是表达人类价值追求、伦理规范、社会理想、审美追求的舞台。现代社会“更快、更高、更强”作为竞技体育所追求的理性目标,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人类学、伦理学、哲学底蕴,正是这份底蕴构成了现代体育竞技的精髓与内核。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竞技运动以其表现了人类最原始和最本质性的力量,也同时体现了人类自身的全面价值。竞技运动有效地保存了人类作为生物链环中具有平权意义物种的存在方式,成为了人类具有恒定性独立尊严的象征物。”^[9]“竞技运动固然有人类自我‘超越’的一些特征……但我认为,某些丧失掉了的人类本性的‘回复’‘回味’和‘自然化’才是竞技运动更深刻的本质的内核。”^[10]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当代人之所以如此痴迷于竞技体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竞技体育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精神,这种公平竞争精神可以被视为现代民主与竞争的理想象征,正如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利波维茨基所言,“体育是一种伦理理念,是一份对民主平等的激情。”^[11]再者,人类的体育竞技从一开始就深深地表达了人类对公平竞争精神引导下的荣誉感和勇气的崇尚^[12]。从哲学的层面讲,人类的身体在体能方面具有有限性,然而人类的身体却又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一个无限可能的空间就是一个意义的空间、一个审美的空间、一个精益求精的空间、一个技近乎道的空间。因此,竞技运动表达了人们以有限存在追寻无限意义的理想。

“超越”是后人类主义永恒的追求,“极限”永远

只是片刻的停留。挑战极限、不断超越,这是后人类主义哲学的核心,表现在竞技体育领域更是如此。但是,依靠科技获得的强大身体机能而展开的竞技活动,没有任何的文化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意蕴,没有任何对人及其身体的终极关怀与价值体认,因为“更快、更高、更强”本身就是个目的,身体只是个“客体”,一个有待技术开发和改造的“客体”,一个经过改造后时刻追求“超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这一理念的“客体”或者说“工具”。在后人类主义者的竞技观中,“超越”与其说是主体的追求,不如说是技术逻辑的内在要求。“更快、更高、更强”促成了竞技理性与技术理性的联姻。正如《体育技术化的哲学审视》一文中所言:“我们说‘更快、更高、更强’是技术理性的一种反映,是有理由的。我们将体育规定为‘主体人以自身为客体的人类运动’时,就为人们对自身生物体认识和改造提供了合理性……体育理性的存在不仅为人们完成‘更快、更高、更强’理想提供了客观基础,为人类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动力之源,而且还将人类完成对自我的超越这一目标内化为客观的规定。这就必然要求人们为了完成超越自我极限的目标而采取一切有力的手段。”^[13]当人们面对运动纪录一次次无功而返时,当技术力量的神奇一次次展现在人类的眼前时,借助于技术的力量来提升人类运动的能力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当依靠科技的帮助打破尘封的纪录,收获美满的结果后,技术理性就渐渐获得了体育理性的信任,并逐渐形成了“体育-技术”理性价值体系,指导着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竞技体育中,“超越”作为永恒的追求,是无条件的,是自成目的的,技术作为一股力量是应当被崇拜并信赖的。因此,后人类主义者主张对待身体不应该过于保守,而应该积极地拥抱科学技术,让科技真正成为促进体能强大的助手,进而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人类体育的永恒追求。在运动成绩的提升方面,后人类主义者为我们展开的画面是美好的,然而,在科技可能带来竞技水平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安静而理性地回望和思考人类体育竞技的根本意义和价值。

4 科技主导竞技——科幻抑或现实

科技全面改造身体,进而成为体育竞技的主导,是科幻还是现实?在曹荣湘先生选编的《后人类文化》一书中,有一篇苏格兰学者安迪·迈阿所写的文章《机器人健将:在现代社会里迎接超人类主义》。文章认为,后人类主义受到怀疑,主要是因为高科技社会里人们对后人类缺乏理解和认同,人们认为,在



社会实践中,后人类理想的现实化在多变的社会语境中是成问题的,然而体育竞技却为后人类主义的应用提供了一个例证^[2]。竞技运动之所以成为后人类主义者实践应用的领域,安迪·迈阿认为这主要是由3种因素决定的:“趋向:绩效的增强”“认可:更快、更高、更强”“依赖:观众的兴奋”^[2]。也就是说,渴望获胜(这也可以理解为运动员或者运动员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权力意志”的内在要求)、追求超越(对“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认同)、依赖观众(如果运动成绩达到某一水平,运动员不再破纪录、能力总是不再提高,那么该运动很可能失去它的吸引力、失去它的观众、失去它赖以存在的资金)这3个条件内在要求现代竞技体育将越来越依赖科技的力量,进而成为后人类文化的急先锋。

的确,当今,在“技术理性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的价值核心重要的构成部分,成为深刻地影响体育发展方向的现实性的力量”的时候^[3],虽然人类还尚未自主进化到后人类阶段,但现代竞技体育却已经部分呈现了后人类主义者所设想的体育竞技的最本质特征:崇拜并依赖科技。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北京晚报》就曾有一篇《运动员已经成为“科技人”》的报道,写道:“正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大量专为运动员服务的新科技,把现代运动员训练成超级选手。从饮食、训练过程、体能分析、运动服装等,都是藉由科技的协助,让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做完美的演出。”伴随纳米技术研究的深入,或许未来的“田径运动员可在脚、手、腿、臂植入一种超微型泵机以增加自身的爆发力,而体操运动员也可在不同的身体部位植入自身所需功能的超微型机以提高动作的稳定性、柔韧性和持久性,游泳运动员也可借助这种超微型机而获得优异成绩。”^[4]同时,伴随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可以通过基因调控防止运动性疲劳和加快恢复过程;利用基因诊断技术对运动员进行身体机能评定;利用转基因技术改造人体化学组成;建立运动性伤病与运动意外基因诊断系统,进行运动员基因选材等。”^[5]由此看出,在竞技夺标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科技已经成为竞技成绩提高必不可少的手段,“体育-技术”理性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感。伴随神经科学、神经药理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太空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众多利益因素的推动下,现代竞技体育已然正悄悄向后人类主义者主张的“科技体育”的方向发展,竞技人俨然成了竞技赛博人。但在科技体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始终认识到,科技肆无忌惮地对身体的侵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竞技的存在形态消解了现代体育的文化

意蕴,颠覆了现代体育的伦理秩序,也冲散了现代体育的哲学内涵。同时,“技术过度扩张会致使人类身体运动能力发生退化,呈现身体的去中心化,最终会导致运动项目的消亡和人类主体性的消失”^[6]。因此,现代竞技体育为消解技术理性的霸权,抵抗功利思维的侵蚀,保持竞技体育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底蕴,应加强“自律”,加强“自觉”,增强“反思”能力,给自己确定并设置严格的技术界限。

5 结语

当前学术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关注,本质上是技术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科学主义以及技术理性的反思。竞技体育始终应该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身体的竞技,而不应该是科技主导的竞技。身体的有限性、神秘性恰恰塑造了竞技体育的魅力,竞技体育领域科技肆无忌惮地渗透实质上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同时,对科技的过度依赖也将动摇以自然身体为中心形成的竞技体育发展的秩序,并将扩大竞技体育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另外,在科技塑造强壮身体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往往是不可逆的,这些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在20世纪以来的‘大科学’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所带来的‘风险社会’问题的日益加剧,我们不仅要关注于‘建构’科学的事实问题,而且更需要思考‘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科学的价值问题”^[7],体育科技的发展同样如此,只有关注于体育科技的人文关怀,才能在当下高科技历史语境中,使体育科技、人类身体以及体育文化健康、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邢冬梅,毛波杰.科学论: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15.
- [2] 曹荣湘.后人类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8,47-159.
- [3]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1:149.
- [4]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3.
- [5] Shilling C.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95.
- [6] 吴文新.慎重对待人的自然——从人的自然属性看科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6-9.
- [7] 陈月华,王妍.机器与身体[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47-50.

(下转第92页)



- 况的调查与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9(2):51-53.
- [23] 曹斌.篮球运动员损伤部位的流行病学分析[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7,15(15):136-137.
- [24] 白银龙,柳景.世界优秀篮球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流行病学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报,2012,28(5):43-45.
- [25] 魏东凌,周琳,李凤莲.中国跳水队运动员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运动损伤调查分析[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4,33(1):67-70.
- [26] 马玉河.优秀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慢性运动损伤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3(5):526-527.
- [27] Agel J., Olson D. E., Dick R.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of Collegiate Women's Basketball Injuries: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 1988-1989 Through 2003-2004[J]. Journal of Athletic Training, 2007, 42(2):202-210.
- [28] Holtzhausen L. J., Schwellnus M. P., Jakoet I., et al. The incidence and nature of injuries in South African rugby players in the rugby Super 12 competition[J]. S. Afr. Med. J., 2006, 96(12):1260-1265.
- [29] Deitch J. R., Starkey C., Walters S. L., et al. Injury Risk in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s A Comparison of Women'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thletes [J]. Am. J. Sports Med., 2006, 34(7):1077-1083.
- [30] Timpka T., Jacobsson J., Ekberg J., et al. Meta-narrative analysis of sports injury report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e Injury Definitions Concept Framework (IDCF): A review of consensus statements an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athletics (track and field)[J]. Journal of Science & Medicine in Sport, 2015, 18(6):643-650.
- [31] Hulin B. T., Gabbett T. J., Caputi P., et al. Low chronic workload and the acute:chronic workload ratio are more predictive of injury than between-match recovery time: a two-season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elite rugby league players.[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6, 50(16):1008-1012.
- [32] Dye S. 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atellofemoral pain: a tissue homeostasis perspective[J].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05, 436: 100-110.
- [33] Magnusson S. P., Langberg H., Kjaer M. The pathogenesis of tendinopathy: balancing the response to loading [J]. 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 2010, 6(5):262-268.
- [34] Lipps D. B., Wojtys E. M., Ashton-Miller J. A.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fatigue failures in knees subjected to repeated simulated pivot landings[J].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3, 41(5):1058-1066.
- [35] Gandevia S. C. Spinal and Supraspinal Factors in Human Muscle Fatigue[J]. Physiological Reviews, 2001, 81(4): 1725-1789.
- [36] Viljoen W., Saunders C. J., Hechter G. D., et al. Training volume and injury incidence in a professional rugby union team.[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09, 21(3):97-101.
- [37] Gabbett T. J., Ullah S., Finch C. F.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for contact injury in professional rugby league players: Application of a frailty model for recurrent injury[J].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2012, 15(6): 496-504.
- [38] Orchard J. W., Blanch P., Paoloni J., et al. Fast bowling match workloads over 5-26 days and risk of injury in the following month[J]. Journal of Science & Medicine in Sport, 2015, 18(1):26-30.
- [39] Lyman S., Fleisig G. S., Andrews J. R., et al. Effect of pitch type, pitch count, and pitching mechanics on risk of elbow and shoulder pain in youth baseball pitchers. [J]. Am. J. Sports Med., 2002, 30(4):463-468.

(责任编辑:刘畅)

(上接第79页)

- [8] 韩小谦.追问技术必然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3):54-57.
- [9] 路云亭.竞技的本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6):461-464.
- [10]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97-427.
- [11] 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倪复生,方仁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5-116.
- [12] 刘欣然,周财有.体育运动中人类身体行为的哲学解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9):16-19.
- [13] 董传升.体育技术化的哲学审视[J].体育文化导刊,2006(11):31-34.
- [14] 申建勇,傅静.纳米技术的发展给竞技体育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对策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1(1):14-16.
- [15] 李元伟.科技与体育——关于新世纪体育科学技术发展问题[J].中国体育科技,2002(6):3-8.
- [16] 代志星,高鹏飞.身体的缺场:体育赛博化嵌入的多重镜像[J].体育与科学,2015(2):109-114.
- [17] 蔡仲.科学论:后人类主义与实验室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6-21.

(责任编辑:晏慧)